

“开展普惠制的职工技能培训，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培养更多劳模工匠人才”“推动完善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鼓励企业落实‘新八级工’制度，打通不同序列间横向贯通的职业发展路径，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宇栋在代表全国总工会做大会发言时提到，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而“大国工匠”从何而来，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级政协委员关注的话题——

培养高技能人才 练就更多“金蓝领”

本报记者 顾意亮 鲍蔓华 范文杰 照宁 江迪 陈小艳 奚冬琪



新华社发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出台，更是捅破了“蓝天天花板”，为年轻人打开了职业发展的又一扇窗。

技能人才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舞台

作为劳动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近年来，上海市在诸多领域开展“上海工匠”“智慧工匠”的选树工作，为各类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机会和舞台。

2022 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上，ARJ21 批产提速的“关键先生”戴渊和完成了 C919 难成形零件的“首席钣金”杨颖华作为上海飞机制造领域首批特级技师代表，获得相关证书，正式成为“新八级工”特级技师。

在中国宝武集团，14 名高级技师通过层层筛选，获评特级技师。“这张证，我等 20 年。”新鲜“出炉”的特级技师金国平说，自己花了 9 年时间拿下高级技师，本来以为职业道路上已经没啥“奔头”，没想到新政策又让他“上了一层楼”。

在江南造船（集团），技能大师陈景毅在收到首批特级技师证书的同时，也收到了同事们的“艳羡”。

不仅在上海市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内陆西部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同样受到重视。

“以前，没有啥技能，只能从事普通工种干苦活。现在，有了职业技能证书，开挖掘机当操作员，挣的工资肯定高。”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安南镇富民社区举办的挖掘机职业技能培训结业仪式上，学员王俊开心地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2023 年，宁夏制定出台 12 个政策性文件，填补了 9 项制度空白，构建了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全链条政策体系，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目前，全区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才总量分别达 36.5 万人、147.7 万人。培育高技能人才 15.9 万人，选拔青年拔尖人才 100 人、自治区技术能手 31 人，培养高技能人才 6503 人，366 位农民获得高素质农民职称。此外，近日宁夏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

除了传统技术工种，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类“数字”工匠正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大方向。

2023 年 4 月，50 名首届“杭州数字工匠”通过技术能力、经济贡献、社会效益等多维度的打分评审，从近 300 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将为杭州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助推杭州数字经济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久前，厦门市举行首次“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旨在培养更多优质的、多元化的应用型人工智能

人才，助力厦门地区人工智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通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让工匠“吃香”成为现实

目前，各地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纷纷出实招、下大力，但依然存在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稳定性不强、队伍结构不优等问题。

“比如存在‘三多三少’的结构性矛盾。即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传统产业技工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技工少；单一技能技工多，复合型技能技工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利明以当地为例表示，宁夏技能人才中，初级工占 50%，中级工占 30%，高级工及以上占比只有 20%，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待遇不高不稳定、成长通道不畅等。

对此，马利明认为，应完善技能等级认定机制，实现有条件的企业、职业院校技能等级认定全覆盖。打破学历、资历、年限、比例等限制，对技术高超、业绩突出的职工，按照规定直接认定相应技能等级，形成符合技能人才成长特点且更加灵活务实的评价标准，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同时，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技术比武、职业技能大赛平台，为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让技能报国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追求。

“现在，社会对技能人才还是存在偏见。虽然近年来国家确立了新的人才标准，过去‘唯学历’‘唯职称’的局面有所改变，但‘读技校、学技能’仍然是低分学生无奈的选择，更多学生仍不愿意从事技能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贾毅认为，需要系统整合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等优势资源，高质量建设一批人才培养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签订订单班、冠名班培养协议等形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打造职教命运共同体，激活人才振兴新引擎。同时，要不健全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实现贯通互评，切实提升高技能人才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

“当下，‘新八级工’设计已经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下一步就是要积极为职工创新创造搭建平台。”上海市

政协委员肖龙根认为，企业要积极主动争取党政领导在课题确立、资金保障、人员配套和资源整合上的支持帮助，把职工创新活动纳入行政的科研盘子，用行政的科研机制推动职工创新活动，使职工的创新创造活动既能培养更多更好的“上海工匠”和特级、首席技师，又能为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和效益。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和企业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往往存在着看不见的‘墙’。创新成果难落地，很可能是被‘墙’挡住了。”肖龙根表示，依托行业党建、工作室党建，“工匠”们跨部门、跨层级、跨专业、跨行业搭建技术攻关和成果交流的平台，乃至组建工匠技师创新工作室联盟，既能解决行业发展最迫切的问题，也能实现“工匠”成长的共建共享。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数字工匠”，浙江省义乌市政协委员吴志民近年来走访调研了当地的多家企业后发现，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领域的新型数字技能人才稀缺，具体表现为招聘难度大、培养周期长且留不住人才，人才流动频繁，区域分布不均等。同时，精通数字技术且深入理解企业业务知识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匮乏，这类人才需要具备跨领域的融合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因此更为难觅。

“现在企业主要通过外部招聘、内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缓解‘数字工匠’短缺。但由于数字技能岗位需求量大增长快，光靠这种方式难以‘解渴’。”吴志民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光靠企业或者高校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多方行动，多方着力，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各自的方法，才能让数字技能人才真正在经营发展中挑大梁、当主角。

江苏省泰兴市政协委员陈辉则建议，强化技能薪酬激励导向，推动“以技提薪”，营造职工得实惠、企业得技能、社会得发展的良好氛围。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让技能等级认定深入生产一线，走进企业车间、走入职工身边，高级蓝领“吃香”成为现实。

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关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进一步

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除了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构建有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也是重中之重。

“随着产业的集聚和升级，对技能人才提出更高要求的企业越来越多，过去分散式的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一趋势，也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成长。”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委员、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双元制学院副院长苗向阳认为，应大力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按照“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可以规模化、高标准向区域内企业输送现代产业技术工人，同时向域内企业提供职工岗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服务，建设产业工人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紧紧围绕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制定‘工科黄埔’行动计划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依托青岛市 24 条重点产业链，打造‘以工为主、特色鲜明’的专业建设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育聚管用’为导向，探索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水平专业群，推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这是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铨的实践。

福建省政协常委、民进厦门市委会主委吴丽冰则一直看重重“以科教融汇”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从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议明确高职院校侧重科技应用和技术开发的科研定位，提供更多参与高规格科研项目机会。构建区域性、地方性科教融汇平台，作为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行业、企业联合开发实施科技创新项目的实践载体。加强跨领域产教融合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科技研发。

同时，进一步推动产业学院建设，鼓励本地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积极参与，对就业人员缺口较大领域的龙头企业参与本地产业学院建设的，根据初期投入制定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优化产教融合载体阵地布局，鼓励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校企合作项目建立在产业园区、科技园。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推动学校与企业科研、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高水平科技创新与高质量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厦门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厦门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杨军也提到，应完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机制。“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需要全社会多方行动，多方着力，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各自的方法，才能让数字技能人才真正在经营发展中挑大梁、当主角。”

“可探索建立学徒留任诚信评价机制。”杨军提出，单靠签订服务期协议并不能有效提高学徒的留任率，建议对未能履行服务协议的学生，要求其除向企业支付违约金之外，政府部门可以将该行为纳入个人的劳动保障诚信评价体系，提高其违约或跳槽成本。同时，加快用人单位自主评价进度。

“建议规范电商直播机构主播带货行业运营标准。”在陈中红看来，要进一步推动电商法、反垄断法的落实，对“大数据杀熟”、对电商平台经营者提供补贴优惠限制、对隐形刷单造成退货给商家带来损失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直播机构主播带货行业收费标准，实施合理收费及透明的税收政策，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有效指导与严格监管；强化平台管理机制，对于虚假广告宣传扰乱市场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

“国家要加大力度支持传统实体小商户经营，如出台租金和装修补贴政策，老年化社区加大重点补贴；给予困难地区农民基地帮扶补贴；继续加大税收减免政策等。”陈中红提出，要通过引导和政策支持相结合，支持多种营销业态共存平衡发展，促进实体小商户注重产品品质控制，提高服务质量，与电商平台形成错位发展，做精做专，树立品牌价值；创新思路，通过与电商平台整合营销，与特色文旅相结合营销等，走出不可替代的实体新路。

让电商平台赋能家电换新

——访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海淀区委会主委赵晓光

本报记者 陈建萍

近一段时间，国家密集释放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的利好信号，3月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3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海淀区委会主委赵晓光告诉记者，“电商平台基于自身庞大用户基数、高效的物流配送能力和数据化管理流程，应该在家电以旧换新服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建议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实体店一样，适用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支持和补贴措施，这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推动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不可忽视的一环。”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已超过30亿台。赵晓光说，“上一轮政策密集发布是在2009-2011年，白电产品更新周期基本在10-12年，目前我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落地，预计将释放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虽然以旧换新逐渐成为主流家电购买方式，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家电零售渠道逐步从“线下为王”向线上线下协同。根据尚普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线上渠道占家用电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42.7%，较2019年提高了8.8个百分点。由此，电商平台有望成为本轮家电以旧换新的主渠道之一。

让人欣喜的是，电商平台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一站式以旧换新”服务，利用强大的物流整合与回收处理能力，实现新品配送安装与旧家电回收同步完成。“前两天我在网上选购了一台电热水器，在线预约师傅提前上门查看安装位置给出选择产品型号建议，只花不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新旧家电无缝对接，避免了分别预约、多次等待的繁琐过程，有着不错的用户体验。”赵晓光讲述了她的故事，并告诉记者，“其实我家的热水器也没到不能用的时候，只是新品有了除垢功能，又能享受国家补贴，我们就索性换台新的。”

记者获悉，家电以旧换新消费杠杆效应显著，根据天猫家电数据测算，每投入1元换新补贴撬动超20元家电消费。从2022年6月到2023年12月，天猫平台持续开展“一站式以旧换新”活动，联合超过900个国内外知名家电品牌、4000多家店铺开展以旧换新服务，覆盖了大家电、手机数码、电脑办公设备以及清洁电器等多个家电品类，惠及全国26个省（区）超400万消费者。2023年，天猫平台消费电子产品类的以旧换新产品销售量超265万件，交易额高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2%，对促进消费升级、拉动内需

全国政协委员热议：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孙全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以旧换新可以为存量市场打开向上增长的通道，有效激发多方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曹鹏表示，数字技术在不断创造新的消费模式，持续提升产业链效率，从成本、效率、体验三个层面带动了消费增长，也会在以旧换新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价值。

对此，曹鹏建议，强化数智供应链创新，通过反向定制（C2M）等模式，创造更符合每个消费群体的新产品、新服务。同时，利用数字化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新业态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以旧换新的效率和便利性。同时，还可借助AI技术智能助手为消费者进行导购，个性化咨询对比，顺利完成换新过

具有很强的正向积极作用。

更令人期待的是，电商平台凭借其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用户的特性，能够促进废旧电器的回收再利用，实现全链条绿色循环。赵晓光告诉记者，“我国家电年度报废量超2亿台，目前家电回收以线下和流动回收为主，而电商平台家电拆解回收流程涵盖从用户端回收至末端处理全过程的可控、可追溯，对于缓解资源紧张、降低环境污染、资源循环利用都有显著社会效益。”

不过，赵晓光也发现家电以旧换新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家电品类如何进一步扩大。当前，家电以旧换新主要为高残值产品，针对低残值甚至无残值且拆卸与回收处理相对复杂的产品目前覆盖范围不足；二是覆盖区域如何从城市向县乡扩大。目前电商平台以旧换新主要以城市用户为主，亟待扩展至偏远特定区域的消费者都能便捷地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以旧换新操作；三是平台、厂家、服务商联动提升服务体验。从家电预约上门、新品配送安装到旧品专业拆解回收等各个环节的服务，更好无缝衔接的一站式服务才能不断优化消费体验。

“以前政府补贴家电以旧换新，是采取将企业纳入相关名录的方式，这对中小家电企业不太友好。在当前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这笔钱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补贴到家电企业，能够追踪每一笔订单的购买、安装、回收等记录，做到实时动态核销，中小商家也有机会享受国家政策，还可避免骗补等不良行为，有利于提高效率，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用。”为此，赵晓光建议，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设立互联网平台专项扶持资金。二是针对电商平台制订以旧换新实施细则，明确电商平台在旧物回收、新品兑换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探索跨品类以旧换新的模式，扩大以旧换新业务场景，引导其积极参与绿色环保行动。三是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与线下实体企业合作，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以旧换新服务体系，方便消费者进行旧物回收和新品选购。四是推动二手物品交易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二手物品的鉴定、评估、分级等相关标准，并完善相应的评价体系、纠纷解决机制。五是鼓励和支持平台开展社区回收模式创新。针对低值可回收物（如家具、旧衣等）单体价值不高、物流成本较大、回收不便利等痛点问题，鼓励地方增设多品类的社区回收站点，基于二手闲置交易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助力社区实现便民回收的数字化转型。



为全面提高少年儿童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日前，北京市经开区消防救援支队邀请了辖区人大附中经开学校的学生们走进瑞合路特勤站参观学习，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图为同学们在消防宣传员的带领下来到了科普展馆进行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

规范“直播机构”带货 扶持实体小商户发展

本报记者 张原

消费群体表现出来的消费习惯、方式与喜好，时刻都在影响着零售业品牌、市场、企业、销售等各个环节。

网上消费透明度和效率都高，直播带货直观有趣……在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背景下，不断孕育出的新产业链，催生大量新职业，电商平台等全数字化消费场景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商业化模式，尤其为助农助困，帮助源头农民打通销路，实现源头对接创造了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深入调研了解到，“直播带货”的产业化，对实体小商户发展已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实体小商户的存在与健康发展，可以

带动就业、活跃地方经济，展现人间烟火气。

如何让二者平衡发展？陈中红调研发现，“缺乏创新”的营销模式是影响实体小商户竞争发展的因素。实体小商户受电商冲击是外因，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是内因。实体小商户大多是最传统的营销模式，单一化、同质化，创新能力不足，加上运营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到位，即使没有电商围堵，也经营困难。

电商营销催生“直播带货”形成各种“主播营销”的产业化。陈中红了解到，直播机构营利模式是收取商家坑位费和商品销售提成，一般直播

坑位费根据主播咖位和销量来定，看似合理，但过高的坑位费及压得过低的商品价格，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等成本，带货网红基本是以低廉价格吸引消费者换取销量，压低价格及赠品等成本都要由商家承担，盈利很薄甚至亏损。被培养出来的消费群体的网购习惯与直播机构网红带货模式共同挤压传统的销售渠道，冲击着实体商户。

扶持实体小商户发展，遏止电商行业垄断发展势头，关系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稳定，多业态共生共存平衡发展利国利民。陈中红认为，我国多层次人口众多，实行多种经营业态共存，对社会经济和百姓需求的平衡充分发展有着深远意义。